



| 光明社科文库 |

唐宋时期五台山 景观资源与朝拜活动

王 涛◎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光明社科文库 |

唐宋时期五台山 景观资源与朝拜活动

王 涛◎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与朝拜活动 / 王涛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194-5136-3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五台山—文化研究—唐
宋时期 IV. ①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0851 号

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与朝拜活动

TANGSONG SHIQI WUTAISHAN JINGGUAN ZIYUAN YU CHAOBAI
HUODONG

著 者: 王 涛

责任编辑: 曹美娜 朱 然

责任校对: 赵鸣鸣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电 话: 010-63131930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7019571

开 本: 170mm × 240mm

字 数: 253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5136-3

定 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丰富及朝拜活动兴盛的背景 1

第一节 唐宋时期良好的政教关系 1

一、唐代的政教关系 1

二、宋代的政教关系 4

第二节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以及五台山寺院经济的繁荣富庶 7

一、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7

二、唐宋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繁荣富庶 17

第三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交通体系 29

一、唐代通往五台山的道路四通八达 29

二、宋代通往五台山的道路与政局变化紧密相关 32

三、唐宋时期通往五台山的道路上存在大量“普通院” 33

第二章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方位范围及自然景观 37

第一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方位范围 37

第二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各台位置、方圆里数及自然景观 43

一、唐宋时期五台山各台位置 43

二、唐宋时期五台山各台方圆里数 46

三、唐宋时期五台山各台自然景观 48

第三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地质地貌景观 53

一、五峰高耸、台顶平缓 53

二、千峰百岭、山峦叠嶂 55

三、洞窟遍地、峡谷众多 57

第四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气象气候景观 59

一、唐宋时期五台山气象气候景观的具体表现 59

二、五台山气象气候景观的形成原因分析 64

三、五台山天气清凉、多云、多雾、光照强的影响 67

第五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水文景观 73

一、河流纵横 73

二、深谷纵横、泉水淙淙 74

第六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生物景观 76

一、仙花瑞草筑灵境 76

二、万壑嘉木显殊异 79

三、丰饶药材凸神圣 82

四、珍禽瑞兽彰化现 85

第三章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物质文化景观 88

第一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寺庙 88

一、唐宋时期五台山寺庙的规模、概况及风格特征 89

二、唐宋时期五台山寺庙繁盛的原因 100

三、唐宋时期五台山佛寺对僧众朝拜活动的影响 103

四、唐宋时期五台山寺庙的典型代表分析 104

第二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室、塔、堂、窟等胜迹 112

一、唐宋时期五台山的室、塔、堂、窟等胜迹的分布情况 113

二、唐宋时期五台山胜迹典型代表分析 113

第三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的“灵迹” 122

一、唐宋时期五台山“灵迹”的分布 122

二、唐宋时期五台山“灵迹”典型代表分析 122

第四章 唐宋时期五台山文殊信仰与民间信仰 126

第一节 唐代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形成 126

- 一、唐之前文殊信仰的流布是五台山文殊道场形成的历史渊源 126
- 二、唐代五台山正式成为文殊菩萨的止住地是文殊道场形成的前提条件 134
- 三、统治者的政治支持是五台山文殊道场形成的必要条件 149
- 四、佛教各宗派的鼎力扶植是五台山文殊道场形成的内部力量 154
- 五、世俗信众的强力接纳是五台山文殊道场形成的肥沃土壤 172
- 六、世界崇拜是五台山文殊道场形成的国际环境 176

第二节 宋代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发展 179

- 一、宋代皇室对五台山文殊道场的继承与推广 179
- 二、宋代官员对五台山文殊道场的推广 181
- 三、宋代民众对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宣扬 185

第三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民间信仰

——以龙神信仰为考察个案 192

- 一、唐宋时期五台山文殊道场中龙神信仰的兴盛 193
- 二、唐宋时期文殊菩萨与龙神之关系 200
- 三、文殊道场中的龙神信仰：中印文化交融、互动之见证 203

第五章 唐宋时期僧众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07

第一节 唐宋时期西北僧众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07

- 一、唐宋时期西北僧尼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08
- 二、唐宋时期西北信众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12
- 三、唐宋时期西北僧众到五台山朝拜活动分析 214
- 四、朝拜活动所见圣地搬迁的渐趋推进 217

第二节 唐宋时期中原及东北地区僧众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18

- 一、唐宋时期中原及东北地区僧尼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18
- 二、唐宋时期中原及东北地区俗众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22
- 三、唐宋时期中原及东北地区僧众到五台山朝拜活动分析 228

第三节 唐宋时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僧众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29

- 一、唐宋时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僧尼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29

二、唐宋时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俗众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32

第四节 唐宋时期国外僧人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 233

一、唐宋时期国外僧人往五台山朝拜活动概况 233

二、唐宋时期国外僧人往五台山朝拜活动分析 237

第五节 《古清凉传》所载僧众到五台山朝拜活动典型事例分析 238

一、俗众到五台山朝拜活动典型事例分析 238

二、高僧大德到五台山朝拜活动典型事例分析 244

第六节 唐宋时期五台山僧尼的外出活动 249

一、唐宋时期五台山僧尼外出活动概况 250

二、唐宋时期五台山僧尼外出活动的主要内容 251

三、唐宋时期五台山僧尼外出活动的影响 253

第一章

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丰富及朝拜活动兴盛的背景

唐宋时期，五台山拥有丰富的地质地貌、气象水利、植物动物等自然生态景观资源，亦有寺庙、浮屠等壮丽的物质文化景观资源以及辐射范围较大的文殊菩萨信仰、民间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资源，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台山异彩纷呈的景观资源。与此同时，国内、外僧众不辞劳苦、不远万里前来朝拜五台山、朝拜文殊信仰，五台山的僧尼也走出山门，取长补短。如此丰富的景观资源和兴盛的朝拜活动与这一时期互动良好的政教关系、较为富庶的寺院经济以及便利发达的交通密不可分。

第一节 唐宋时期良好的政教关系

本节所指的政教关系主要指政治与佛教关系而言。唐代，良好的政教关系与历代帝王对佛教的不排斥甚至支持关系密切。

一、唐代的政教关系

唐代的统治者一般都崇信佛教，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太宗早期重道崇儒，但并不排斥佛教，偶尔也利用佛教。如唐太宗曾在当年各个战场处建立寺庙，以超度亡灵，为死难的将士祈求来生。据《全唐文》（卷五）记载，唐太宗曾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云：“日往月来，逝川斯远。虽复项

籍方命，封树纪于邱坟；纪信捐生，丹青著于图史。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① 这就说明唐太宗还是相信佛教某些理论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并带回来大乘佛经，唐太宗派房玄龄前去迎接。当玄奘回到长安后，还积极为玄奘提供译经场所。唐太宗晚年，亲听玄奘讲佛论法。这些事例都说明唐太宗并没有反对佛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较为支持。此外，唐太宗还首度诏示佛骨，贞观五年（631年），岐州刺史张德亮上奏，开启法门地宫，以示佛骨。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其文：

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光相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②

唐太宗对佛教的优容态度，是佛教在李唐王朝能够发展到极盛的重要基础。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佛教，尤其是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成为事实上的“国教”。高宗李治身居太子时，为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大慈恩寺；显庆四年（659年），奉迎佛骨舍利，《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其文云：贞观“至显庆五年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开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日奉迎护舍利，二圣亲造九重宝函”。再于龙朔二年（662年）送还法门寺，前后历经四年，规模可谓宏大。这一时期石窟也大量开凿。

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

①（清）董诰，《全唐文》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

②《法苑珠林》卷38，《大正藏》第5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3年。

造《大云经》制造舆论而称帝，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大云寺，修铸佛像，采取了举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华严宗的创立便直接受益于她的大力支持。此外，她还接待各方译僧。鉴于禅僧在民众中影响日益上升，她对著名禅师待以师礼，助长了禅宗的发展。武则天时期，“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① 佛教得到长足发展。

唐玄宗曾经有意识地改变开则天时期的国策，如对佛教不再狂热推崇等。但实际上唐玄宗也无法控制自己对佛学中因果报应的迷信，他对佛教的不良现象只是稍加抑制，其实他在位的前期，对佛教也是持以支持态度的，如他支持“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创立密宗。特别是唐玄宗亲自受不空灌顶为菩萨戒弟子，这在帝王中也是少有的。

唐玄宗之后的诸帝迎佛骨达到狂热，也是历代绝无仅有的。唐代的佛教达到鼎盛。唐代皇帝在奉迎佛骨的同时，也进行大量布施。《资治通鉴》就有类似的记载：“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师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相侈靡。”^②

唐代皇族对佛教的信仰，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释囚、祈雨等，以及对一些高僧大德给予很高的礼遇，如赐紫、赐号、赐爵等，还给予一些高僧国葬之礼。按照唐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所穿官服是紫色，而五品以上是绯色（大红），但有时一些品级不够的官员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着紫服。唐朝时期的一些大德高僧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紫袍。唐文宗时，高僧宗密被赐紫。唐宣宗时，内供奉僧栖白也曾被赐紫。有的高僧也被赐号，这些号主要有谥号、国师号、名号等。武则天赐华严宗高僧法藏为康藏国师，又封赐其为贤首的名号。唐玄宗赐密宗高僧金刚智“国师”称号，后又赐号“大弘教三藏”。唐代宗赠赐密宗高僧不空为“司空”，更加“大辩正”的谥号。有时还赐给高僧以官爵，唐玄宗恩赐善无畏为鸿卿，代宗时，赐金刚智为开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5《苏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48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13页。

府仪同三司，还恩赐不空为肃国公，并且食邑三千户。

在助推佛教大力发展的同时，朝廷也在强化对佛教的管理。唐初，朝廷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僧团管理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于此期间的兴盛。唐代的僧团管理制度大致包括：僧众法律地位制度、僧尼度牒制度、僧籍管理制度、佛寺营建制度以及佛教官寺制度等。

除武宗外，代宗之后基本上都能保持大体良好的政教关系，这是五台山景观资源迅速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

政治力量给予佛教鼎力支持，佛教反过来在维护国家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为唐代互动良好的政教关系。

二、宋代的政教关系

宋朝立国之初，建隆元年（960年）六月，宋太祖在平定李筠叛乱之后所颁发的“德音”诏书中，就下令“诸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①表明宋太祖已经开始着手纠正周世宗时对佛教的过激政策。乾德四年（966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请游西域取经，各赐钱三万遣之。”^②说明宋太祖对佛教徒赴西土取经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开宝四年（971年）下令刊刻佛教大藏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刊刻全部佛经。其在位期间，官方还投资修建或扩建了一些寺院，如扬州建隆寺、开宝寺等。

宋太宗对佛教更加尊崇，曾说：“佛氏之教有裨于政理，普利群生，达者自悟渊源，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识其宗。……如梁武舍身为奴，此小乘偏见，非后代所宜法也。”^③他对相国寺佛牙撰了赞偈，在建开宝灵塔以藏佛舍利时，“为之悲涕。”其在位期间，创立译经院、内道场，并下令在全国普度僧尼，诏书称：“朕方隆教法……并特许剃度。”^④这次共度僧尼十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页。

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36页。

③（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3，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第1843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52页。

七万余人，大约超过原有总数的一半。^①与此同时，以财力支持佛教事业，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敕内廷张廷训往五台山造金铜文殊菩萨像，敕安于真容院。诏重修五台十寺。^②宋真宗时，有人上书曰：“‘愚民无知，佞佛过当，谓舍财可以邀福，修供可以减罪，蠹害斯甚，宜行禁止。’上曰：‘习俗既久，安可遽绝？然佛之为教，本于修心，若能悟理，为益滋大。又其教尚忍，则国君含垢，亦其义也。国君苟能忧勤政治，惠养兆民，不必像设，自为功德耳。’”^③宋真宗崇佛超越前代，宋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至天禧五年（1021年），“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④在现存史料中这是宋代僧人人数的最高纪录，可见宋真宗时佛教之兴盛。南宋时期，僧志磐曾高度评价真宗对佛教的尊崇：

真庙之在御也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过于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则有《圣教序》《崇释论》《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遗教二经》，皆深达于至理。一岁度僧至二十三万，而僧众有过者止从赎法。上元幸诸寺礼像百拜弗辞，复唐家天下放生池，以广好生，皆本于宿愿，而发于圣性，非俟于劝也。至于继世译经大开梵学，五天三藏云会帝廷，而专用宰辅臣兼润文之职，其笃重译事有若是者。当时儒贤如王旦、王钦若、杨亿、晁迥辈，皆能上赞圣谟，共致平世，君臣庆会允在兹时，稽之前古未有比对。^⑤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太宗和宋真宗对佛教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识到佛教在社会上能起到良好的作用，通过保护和扶持佛教，有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宋仁宗自即位起就对佛教特别恭敬，常顶戴佛像接受百官朝拜。“仁皇

①（宋）志磐，《佛祖统纪》卷52，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第1935页。

②（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4，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第1896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488页。

④ 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道释1，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8页。

⑤（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4，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第1896—1897页。

每日头上戴一枚（玉佛），大者幞头帽子里戴，小者冠子里戴，尝言：‘我无德，每日人呼万岁，教佛当之。’”^①又见《佛祖统纪》载：“天圣元年（1023年），上帝（常）顶玉冠，上琢观音像，左右以玉重，请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于下者，皆天下英贤，岂朕所敢当，特君臣之礼不得不尔，朕冠此冠，将令回礼于大士也。”^②言语之间透露出宋仁宗对佛教是发自内心的崇敬，皇帝崇佛，其下百官自然也会随之崇佛敬僧。

宋神宗依然是认同佛教的，从其在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与王安石等人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

甲午，上谓王安石等曰：“蔡确论太学试，极草草。”冯京曰：“闻举人多盗王安石父子文字，试官恶其如此，故抑之。”上曰：“要一道德，若当如此，说则安可臆说，诗书法言，相同者乃不可改。”安石曰：“柔远能迩，诗书皆有是言，别作言语不得。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③

王安石读佛书，认为其中的道理与儒家经典相契合，宋神宗也认同他的这种观点，由此可见，他们对佛教是持友好态度的。

宋徽宗时僧人宝觉大师曾褒扬宋代帝王对佛教的尊崇：

若我艺祖皇帝，始受周禅，首兴佛教，累遣僧徒往西域，益求其法。太宗皇帝，建译场，修坠典，制秘藏詮，述圣教序。真宗皇帝，制法音集，崇释氏论。仁宗皇帝，躬览藏经，撰写天竺字，日与大觉师怀琏、庚歌质问心法。英祖、神考，继体守文。哲宗皇帝，在储宫日，神考不豫，时读佛经，祈圣躬永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于正，则曷足以

① 钱世昭，《钱氏私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12，小说家类1。

②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5，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第1899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59—5660页。

致历代帝王之崇奉哉?^①

宋代帝王在不断崇奉佛教的同时,也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僧官的任命权关系到国家对佛教的控制程度,关于宋代僧官的选任,汪圣铎在《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有关官府根据僧道众或他人的推荐选任,二是依资格序进,三是由皇帝降旨委任,四是官方对有功于国的僧道予以委任。”^② 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宋朝统治者严格僧官的选任,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御便殿引对诸寺院主首,询行业优长者次补左右街僧官。先是,道官上令功德使选定迁补,所置或非其人,多致谤议,故帝亲阅试焉。”^③ 宋代皇帝亲自主持僧官考试,说明了宋政府对僧官任命的重视,也是政府加强佛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总之,宋代僧官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利用僧官制度可以对佛教进行有效地渗透和控制,使佛教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总体而言,宋代皇帝对佛教实行了保护和利用的政策,借助它来维护社会安定。但客观上,则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五台山景观资源的发展和朝拜活动的兴盛便在此背景下形成。

第二节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以及五台山寺院经济的繁荣富庶

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的丰富以及朝拜活动的兴盛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五台山寺院经济的繁荣富庶密不可分。

一、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唐帝国的大部分时期经济繁荣,首先由于国家统一、交通便利,如陆路

① (元)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19,《大正藏》第49册,第2036页。

② 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9页。

③ 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道释1,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5页。

从长安向东可达朝鲜,向西经丝绸之路,可达印度、伊朗和阿拉伯各国。海路从登州或扬州可到达朝鲜、日本,从广州可到达马来半岛、印度和波斯湾。此外,内陆还有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其次由于推行均田制,并且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政策,使农民安心生产,奠定了经济发展的雄厚基础。再次各民族之间进一步融合,加快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统治者以宽容开放的心态,使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社会经济持久繁荣与发展。

1. 唐代社会的迅速发展

(1) 唐代农业的迅速发展

经过隋朝末年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唐初李世民励精图治,注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不夺农时”、减少徭役征发、兴修水利、对归来的流民减免赋役等措施。很快就出现了《贞观政要》所描述的情景:“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圉圉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时虽然赶不上隋朝的极盛期,但已经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小康局面。

武则天也很重视农业生产。从已发现的敦煌户籍残卷中可见,有此时期应授田和已授田的记载,证明还在继续实行均田制。武则天还以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衡量官吏政绩的标准。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户数380万,到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去世时,户数达到615万。

唐玄宗尤其重视通过兴修水利来发展农业生产。据统计,开元时修建水利工程38处,到天宝时又有8处,合为46处。^①开元三年(715年)至四年(716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蝗灾,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派出专使督察州县大力捕蝗,减轻了灾害,使“田收有获,人不甚饥。”^②另外,唐玄宗还在各地大兴屯田,主要有军屯与民屯两种。军屯多在边疆,民屯则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屯田制招抚了大量流民,促进了农业生

① 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玄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44页。

产的发展,增加了国库收入。这时期耕地面积继续扩大,“唐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依唐亩计)之间。”^①随着土地的开发,在今川东、鄂西、皖南、闽西、浙东以及河南中部出现了一些新的居民区,唐政府就地设立了一些新的州县。

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江南地区战乱相对较少。北方人为逃避战乱大量南迁,不仅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先进的技术也随之南传。南方农业的发展与水利工程的兴修有密切关系。唐前期兴建的水利工程是南方少北方多,唐后期则是南方多北方少。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为了防止海潮,曾在今江苏淮安至南通一带筑堤142里,起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在常州武进开孟渎渠,灌田四千顷。南方开垦了许多湖田、渚田、山田,这使水域和山区的土地也得到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工具也大大改进。晚唐陆龟蒙所著《耒耜经》提到,当时江南使用的耕犁由犁壁、犁箭、犁秤等11个部分组成,操作灵活,既可以深耕,也可以浅耕。灌溉工具也有进步,中唐后利用风力或水力转动的水车很普遍,过去使用的桔槔已被认为是落后的农具。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土地的垦辟,使江南的粮食产量大为增加。当时比较各地经济实力,谚称“扬一益二”,扬州在全国各区域中居于首位。

唐代以前人们饮用的茶叶多是野生,唐人则已经掌握了茶树的种植、施肥、下种、中耕及收获等一系列环节,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一书对这些有较详细的记载。

(2) 唐代手工业的发展

唐代手工业迅速发展,并且在许多领域都有不俗的成绩。唐朝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家庭纺织业。《太平广记》(卷二四三)中《何明远》载:“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这样规模的纺织场所,至少工人也在千数上下,不

^① 王钺,《唐代实际耕地面积》,载《王钺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过这种工人究竟是什么身份还值得研究。^① 唐后期南方丝织业有较大发展，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北方，如越州（浙江绍兴）的縠绫、宣州（安徽宣城）的红线毯、荆州（湖北江陵）的贡绫、益州（四川成都）的蜀锦等都很著名。另外岭南的棉织业也有发展。五代时期，“蜀绣”“吴绫”“越锦”等丝织品驰名全国，福建的蕉布、葛布等也比较有名。

唐代制瓷业在规模、技术、艺术等方面超越前代，瓷窑遍及大江南北。造纸业非常发达，宣州出宣纸，扬州出六合笺，广州出竹笺，这些都是上等纸品。宣纸产自宣州府（安徽泾县），自唐以后历代相延。唐后期的造纸业更为发达，重要产地多在南方，除宣纸、六合笺外，益州的麻纸、浙东的藤纸、临川的薄滑纸等都是著名产品。唐代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各地，制茶业已具相当规模，《唐国史补》（卷下）记载了当时的名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笋，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浔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这里共列举名茶19种。唐德宗时开始收茶税，后来成为政府的重要税种。宪宗时，仅浮梁一县每年的茶税就有十五万余贯。

唐代造船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刘晏曾在扬子（江苏扬州）造船二千余艘；民间造的大船，《太平广记》所载俞大娘的商船从事海外贸易，载重上万石，长达二十余丈，载客六七百人。这时在荆南一带，还出现了用脚踏动两轮前进的轮船。

（3）唐代商业与城市的发展

唐代盛世，国家地域辽阔，各地物产不同，社会经济欣欣向荣，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活跃，又促成货币形态的演进。唐时期酝酿着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巨变。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城市比较注重其政治和军事意义，是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而从隋唐开始，其经济性色彩日

^① 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103页。